



内部资料

国际经济观察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bservation

简报系列

(Briefing)

G20 与世界格局

北京外国语大学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网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中国企业国际化研究中心

2016年2月

《国际经济观察》编辑委员会

总顾问：彭 龙 丁 士 张国有

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列）

蔡连侨 蔡芝芳 车 琳 崔 军 戴桂菊 丁红卫 金利民

柯 静 李莉文 李雪涛 李迎菊 李永辉 刘 建 邵建国

史铁强 孙晓萌 陶家俊 万 猛 王建斌 王立弟 王旭东

魏崇新 文秋芳 徐一平 薛庆国 姚晓舟 赵 刚 张 剑

张妮妮 张西平 张晓东 张朝意 章晓英

主编：牛华勇 孙文莉 任康钰

副主编：刘 鹏 马 琳 裴艳丽 钱小沧 邵明星 宋泽宁 吴 浩 詹惠蓉

执行编辑：左 洁 胡慧璟 徐小凤 杨 潇

《国际经济观察》编辑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邮编：100089

电话：010-8881 7751

传真：010-8881 0062

邮箱：g20@bfsu.edu.cn

zuojie@bfsu.edu.cn

网站：g20.bfsu.edu.cn

公众微信号



【编者按】

当前，世界格局正处于权力调整的关键时期，国际形势变化非常之快，为历史罕见。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等全球问题持续恶化，叙利亚问题、乌克兰危机等地区冲突仍未结束。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日趋复杂，既要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又要相互竞争。那么，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又该如何解决？有着较为广泛代表性的二十国集团（G20）能否形成有效机制来真正地将南北国家团结起来应对全球挑战？作为2016年G20峰会东道主的中国又该如何发挥积极作用？这期简报，我们将通过本中心的刘立群和史泽华两位老师的文章，和您一起更加深入地理解世界格局，为2016年G20杭州峰会做好更多思想上的准备。

世界新格局与 G20

北京外国语大学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立群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世界格局纷繁复杂，世界形势风云变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期刊《现代国际关系》，在2015年初由其主编林立民先生撰文回顾2014年的国际形势时就表示，这一年的国际形势是怎一个“乱”字了得。如今，一年过去了，国际社会几乎达成共识的是，2015年的国际局势似乎更加混乱。对于这种空前的乱局，很多人表示比较悲观，有的人提出“了解得越多越细可能就越悲观”；更有甚者，则认为毫无办法，新一场世界大战可能会爆发。

那么，时间到了2016年，我们应该怎样冷静地看待当前世界的乱局？怎样从复杂的格局和千变万化的形势中抓住事情的根本、看到事情的本质呢？关键是靠理论以简驭繁。理论源自实际，又高于实际。迄今为止，很多国际关系理论和社科理论都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进一步说，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仍然缺乏真正的科学、经得住检验和考验的社科理论。多年前，有一本叫做《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的书较为流行。其实，在所有社科中，经济学相对科学性已经比较强了。因此，对于其他社科类学科，恐怕更应该提出“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的问题。

30多年来，我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进行理论研究，尤其是理论创新。首先，我主要是在哲学领域进行理论创新，后来则扩展到相当广泛的社科理论领域。理论本身可能是比较抽象和枯燥的，但对于解释复杂的现象更有说服力。对于研究世界格局、观察世界形势来说，目前最

缺少的、同时也是最需要的就是全面、整体、准确地理论分析框架，从而帮助我们尽可能深刻地认识整个世界及其变化趋势。

接下来，我就对我在多年理论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基本观点即理论视角进行简要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东西方矛盾与南北方矛盾视角，二是利益矛盾与观念矛盾的视角。

理论肯定是以简驭繁，但又不能太简单，因为人类社会极为复杂，太简单的理论必然片面。好的理论既要符合尽可能多的社会实际和事实，又要能自圆其说、不自相矛盾，要能很好地解释其他各种理论不能很好解释的事情。科学研究离不开分类，科学理论肯定包含对各种事实的系统而完善的分类。对人类社会领域的分类很多是相对的和动态的，这是社科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当然，学科划分本身也是相对的。分类必然离不开概括和抽象，必然形成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但在现实社会，事实大都是“混合物”，很少纯而又纯，而理论分类必须是“纯粹的”。由于人类社会情况的复杂和不断变动，所以有些分类是相对的、动态的，例如东西方和南北方这个分类就是相对的，也是动态的，例如过去韩国、新加坡都是穷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后来发展迅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目前金砖国家的发展也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当今时代一般称为后冷战时代，即 1945-1990 年是冷战时期，1990 年以来是后冷战时期。冷战时期是东西矛盾为主、南北矛盾为辅，现在是南北矛盾为主、东西矛盾为辅。难民潮、难民危机可以说是南方国家（非洲、中东）对北方国家的冲击，是南北矛盾的大爆发。东西方矛盾首先是观念矛盾，其次也有利益矛盾；南北矛盾则首先是利益矛盾，其次也有观念矛盾。此外还有北北矛盾、南南矛盾等。

利益可以粗略分为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也可细分为近期利益、远期利益；局部利益、整体利益；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等等。经济利益可以说是财产利益、民生生存问题，安全利益是生命问题，生命安全（例如舍财保命）。一般来说，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

观念可以分为三大类：宗教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学术意识形态。学术意识形态与实际利益问题相距较远，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与实际利益问题相距很近。粗略地说，学术意识形态和实际利益的关联，相对不如政治和宗教与实际利益的关联那么紧密。

政治意识形态还可以细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主要是政治体制。例如，中国和俄罗斯对内的政治意识形态差别较大，但是在对外方面却比较接近；沙特和美国也类似的现象，美国是民主共和制国家，沙特是世袭的君主制国家，它们在对内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差别较大，

但是在对外方面比较接近，这主要出于有共同利益。当然，沙特和美国在宗教意识形态差别也很大。

单纯观念差异或矛盾并不等于有利益矛盾和冲突。例如二战爆发前，苏联和美英以及法西斯德国在政治观念上都有很大差别，但并没有多大利益矛盾。希特勒进攻苏联后两国利益矛盾极其尖锐，苏联不得不和美英联手打击法西斯德国，即苏联和美英在政治观念上的矛盾退居其次。目前俄罗斯与欧美的关系和昔日情况相比也有类似之处。

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主义重视观念的作用，这点可取，但它没有区分开人类观念的基本分类，所以不可能讲清楚各种观念对人类所产生的复杂影响和作用。

各种复杂的利益矛盾及冲突和多重复杂的观念矛盾及冲突导致目前国际社会、国际形势极为复杂。目前世界各国结成反恐、打击“伊斯兰国”的统一战线，有点像二战期间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超越一些分歧和矛盾，但同时也暴露很多复杂的矛盾。最终战胜恐怖主义可以说主要是时间问题，不过即便在战胜恐怖主义之后世界上还有很多深层次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还可能面对新的问题，东西方矛盾，南北矛盾，利益和观念的冲突还会长期存在。

从国际组织角度分析，当前北方国家交往的平台有经合组织、北约、七国集团、欧盟等地区一体化组织，南方国家交往的平台则包括了 77 国集团、非盟、东盟、上合组织、伊斯兰世界联盟（1962 年成立，现有 60 多个成员国，是典型的观念型组织），南北交往的主要平台为联合国（虽说是全球性国际组织，但其中南北分野和矛盾最突出，大量的讨论和争议都是围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展开）、20 国集团。而东西方平台主要包括了欧安组织（被边缘化，但此次在调解乌克兰危机中发挥一定作用），以及若干临时性平台如伊朗 6+1 核问题会谈，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

传统上，国际势力呈现出北强南弱，北方发达国家处于世界中心，在诸多领域处于支配地位，南方国家处于外围、从属地位，目前基本仍如此。不过，近些年南方国家中的新兴国家（金砖四国、五国）正在赶超发达国家，这是冷战后世界新格局的重要变化，但离赶上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心-外围格局会长期化。

从目前人口数目看，南方国家超过 60 亿，北方国家仅 13 亿，而且北方国家生育率低，老龄化较为严重，南方国家普遍生育率高，人口过剩相当严重（当然这也是贫困的根本原因之一）。截至 1945 年之前，全世界人口流动大多是从工业化国家流往殖民地国家。但从二战结束以来，

人口更多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包括最近的欧洲难民潮都是如此，这个移民潮过程会长期化。1800年时全世界只有10亿人（比目前中国人口还少），1900年增加到16亿，1950年为25亿，2000年达到60亿。全球人口迅速增加是导致全世界各种利益矛盾增多甚至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争夺淡水资源、海底油气田、矿产资源等问题增多，领域还扩展到南北极地区、海底甚至外太空、其他星球等。不过任何大的利益矛盾最终都是可以解决的。

从观念角度看，北方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相当接近（都实行民选多党议会制），政体和政局也普遍相当稳定。而在南方国家中，一部分国家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相近，一部分则差别相当大，很多国家的政体还不大稳定，例如阿拉伯之春。一些南方国家政局动荡，部分南南国家之间矛盾上升甚至激化，且都程度不等地有北方国家干预的背景（尤其是北方国家的民间力量即非政府力量）。尽管近年来对南北国家的划分界限相对有些模糊，比如经合组织成员国就包括墨西哥、智利这样的拉美国家，但从主流上发达国家之间认同感较强，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大多是基督教国家，七国集团、北约集团内部都是如此。发达国家之间公开宣称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客观上也有很多共同利益，这是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一大特点。

南方国家，虽然总体数目占多，但意识形态各异，认同有限。以非盟为例，虽然是一个有共同利益的地区组织，但很少提及价值认同。发达国家常常强调价值观念的共同体，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常说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这其实是一个话语的不对称，背后反映的是观念的不对称。其中一个关键性的差异，东方国家愿意强调姓资姓社的问题，西方国家强调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概念，这是话语不同、观念不同，背后是各国主流学术意识形态的差异，我国的主流学术意识形态关注的是姓资姓社之分，而西方主流学术意识形态强调的是民主国家专制国家之分，这种差异由话语不同而体现。

另外，北方国家不仅政府力量较强，民间力量也相当强甚至很强，是“小政府，大社会”，而南方国家大多数政府力量比较强或很强，民间力量普遍较弱。这也是造成北方国家整体强、南方国家整体不够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的来说，北方国家处于更主动的位置，南方国家相对较为被动。这是中心-外围格局的表现。在地区层面上（例如亚太地区），发达国家也处于主导地位。

发达国家内部，美国和日本凭借突出的经济和综合实力处于一流地位，德国实力很强，但其观念相对特殊，其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也很特殊，它更多起到缓和南北矛盾的作用，也包括缓和仍存在的东西方矛盾（主要是与俄罗斯的矛盾），德国反对打伊拉克战

争、没有参与利比亚战争、对打击“伊斯兰国”主要提供后勤保障和侦察行动、尽可能阻止乌克兰危机恶化、在难民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协调中发挥积极作用等都可作为例证。这和德国的历史、和德国对二战的反思，也和其自身学术传统的深刻性有关。

利益问题、利益矛盾主要是贫富悬殊问题，这既要靠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来解决，也要靠全方位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司法体制改革等，以应对社会不公平、不合理现象。但改革只能循序渐进，不能“休克式疗法”，不应出现权力真空。德国各界对此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包括强调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但美国方面的认识似乎还不足，有些简单化、有些操之过急。目前世界的乱局与各方都在犯或大或小的错误有关，而犯各种错误与思想认识即学术观点的混乱直接有关。解决利益矛盾需要各种相关机制，解决观念矛盾最终靠学术理论研究和创新，使全人类在重大问题上逐步达成共识，包括对全球治理的认识。这方面学术界大有可为。

发达国家处于支配地位不仅主要涉及机构和制度层面，同时有着技术层面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当前，这些基础设施的核心都位于欧美国家。

第一，互联网根服务器。互联网是极为重要的全球基础性技术设施，13个根服务器大多在美国、少部分在欧洲，其中最关键的主根服务器在美国，且所有根服务器均由美国政府授权的互联网域名与号码分配机构 ICANN 统一管理。2014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有意把互联网基础资源管理权交给“全球多利益攸关方社群”。如果互联网的全球交流最终都要汇总到美国，美国客观上就有可能监控全球互联网交流了，美国把这一权力移交非官方组织一定程度上可能有避嫌的因素。

第二，卫星导航系统。它也是极为重要的全球基础设施，目前美国 GPS 最为完整成熟，欧洲伽利略系统和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目前使用率都不如 GPS，我国北斗系统仍未完成。总的来说，GPS 还是技术最成熟、应用最广泛的导航系统。

第三，全球支付清算系统。目前 SWIFT 是全球金融业关键性基础设施。2014年夏，曾有英官员声称威胁要对俄切断 SWIFT。欧盟于 2012年3月封堵伊朗接入 SWIFT 系统作为对伊制裁一部分。SWIFT 总部位于比利时，是根据比利时法律成立的。

显然，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再完全另建一套全球基础设施来替代现行基础设施，而是必须纳入现行基础设施。此外在大宗商品定价权诸多经济政治等领域，发达国家也都处于支配即中心地位。发达国家过去是、将来也仍将长期引领世界生产力新潮流。这不等于发达国家的获益必然大于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全世界均衡发展尽可能公平获益。“中心-外围”是人类社会中

客观存在的现象，比如城市和农村相比，城市属于中心位置，农村处于外围位置。问题只在于不应差别太大。

习近平主席近来在多个场合、包括在访美时明确强调中国不会改变现行国际秩序，而是参与现行国际秩序并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个政策是明智的。前不久政治局学习会专门研究全球治理问题。这方面问题十分重要，而且未来值得永远认真研究。

市场经济原则及政治体制改革在全世界都在实施，只是具体举措、举措的力度等不完全相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都不能操之过急。美国所犯的错误在相当大程度上并不是在原则上完全错误，而主要是操之过急，对问题的复杂性及这种急于求成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认识十分不足。而诸如德国在这方面就显示出较大的耐心。

20 国集团(G20)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于 1999 年成立，起初只是 20 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008 年起升格为首脑会议。G20 的宗旨是为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放及有建设性的讨论和研究，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它可以说是南北对话合作的主要平台之一。这种情况在冷战期间不可想象，因为当时东西方冷战压制了南北合作的可能。中国在 2005 年作为主席国主办过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016 年在杭州再次作为主席国。

G20 成员涵盖面广，代表性强，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欧盟、澳大利亚、中国、南非、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韩国。该集团的 GDP 占全球经济的 90%，贸易额占全球的 80%，人口约为 40 亿。我们一方面应当重视和充分发挥 20 国集团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不应夸大它的作用，因为它毕竟是非正式论坛，主要是造舆论、进行交流，不过可以为正式达成协议做准备。

G20 应该抓准全球性的问题，包括贫富差别问题、气候变暖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利益问题，只有通过全世界共同携手解决，单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缺少足够力量去解决。目前关键是缺少世界政府去统筹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各种负面问题。市场经济全球化与迄今缺少全球性管理和监管（世界政府）以及由事实上一个最强大的国家处于支配地位都是相互矛盾的，因任何国家都首先考虑自身利益，只有真正的世界政府才能平衡全世界的利益。全世界未来发展方向就是加强多边合作、加强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的作用，同时必须深化思想认识，淡化各种差异和矛盾。加强全世界合作、最终建成世界政府是世界发展方向，联合国作用会越来越来大，它就是未来世界政府的雏形。

罗列出大量问题和矛盾怎样去解决？最关键是要理论创新，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即学术观念，使真正科学的、正确的观点和知识得到普及，被社会各界、首先是知识阶层、政界接受并逐步实施。全球化迅速发展进程中的大量问题都和思想认识问题有关，思想认识方面的滞后乃至错误会延续老问题、产生大量新问题。这只能通过理论创新加以解决，我们需要更新很多观念。

现代科技已十分发达，社科研究也十分发达，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不过全世界社科领域的主流观点却相差很大且十分混乱，造成各国相互之间信任度不高，尤其是在南北国家之间。要打破宗教观念、政治观念方面的差异和矛盾，关键是社科理论（首先是哲学理论）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同时加强相互交流，最终达成基本一致。

G20 中国元素如何撬动世界大格局

北京外国语大学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研究员 史泽华

2015年12月1日，中国正式接棒G20，开启G20峰会筹备序幕。峰会在中国的召开备受瞩目。世界关注中国如何在世界经济转折时期再次勇挑重担，力挽狂澜。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及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一直引人瞩目。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面临很大的困难。中国在艰难的经济环境中承担起世界经济增长的责任。2009年到2011年间，中国都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前，世界经济正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潜在产出增速放缓，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增大，全球贸易和投资在低位徘徊，高失业问题突出，不平等、不平衡现象困扰着许多国家。主要国家经济走势和政策取向差异加大，宏观政策协调难度上升。世界经济呼唤新的动力。2016中国峰会因此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期待。

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借助这一时机获得更多的世界经济话语权，撬动世界经济的旧格局，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新方向，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形成是主要的关注点。

为此，中国一方面积极调整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推动国内经济的持续发展，继续充当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地区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地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并在全球层面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推动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全球经济金

融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形成。

第一，中国将以经济的绝对增长和中高速发展作为撬动世界经济旧格局的基石。

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从绝对数量来说，仍是第一。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进行结构性调整，与前几年两位数的增长相比较而言，增速确实有所放缓。但从中国当前的经济规模看，中国经济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能达到 30%。就像习近平在土耳其 G20 峰会演讲时指出的，2015 年中国经济实现 6.9% 的增长，其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前几年两位数增长时还要多。前加拿大财政副部长托马斯·贝尔内斯也持此类观点。他称，中国今天 6%—7% 增速所创造的经济增量超过 5 年前 10% 的增速。

为了促进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中国在“十三五”规划中推出了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政策举措，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致力于改变经济发展质量，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同时提出了两个倍增，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习近平在土耳其 G20 峰会上承诺，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为各国发展创造机遇。

第二，中国将以地区层面的合作作为撬动世界经济旧格局的敲门砖。

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增强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逐步从跟跑者转变为领跑者，从学习适应国际规则转变为制定乃至主导规则。但世界发达经济体依靠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依然掌握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严重阻碍世界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机制来寻求改变的同时，还在地区层面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一道，就改变旧体制、建立新体制方面积极努力，就掌握国际体系中话语权，塑造规则制定权方面建立权威性。每年 G20 领导人峰会召开前，中国及其它金砖国家会举行会前会，就峰会的立场协调意见，增强改变旧体制的合力；中国广织“一带一路”经济网，将触角伸向亚洲、欧洲甚至全球的领域，深耕与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的合作；推行亚投行计划，加大对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为周边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启动丝路基金，构建起与新兴国家间紧密的经济和外交关系网络，提高合作水平，共享经济发展机遇。

第三，中国将在 G20 框架内积极推动改革作为撬动旧格局的金钥匙。

G20 在中国的举办对世界新体系的构建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G20 在主题设定和议题选定上将无不融入中国的智慧和理念，使中国长期以来倡导的在 G20 框架内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得到更深入的阐释。

2016 中国峰会的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创新是当前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源。中国在 G20 体制内倡导创新驱动发展,鼓励包括科学技术、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在内的全面创新,打造世界经济新增长源;为了提高世界经济增长的活力,中国提出提高各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质量效益,让世界经济的潜能充分释放;倡导 G20 国家加强经济全方位互联互通和良性紧密互动,合作应对挑战,凝聚发展共识,打造全球命运共同体;继续致力于使增长更具包容性,从而惠及面更加广泛,通过实际行动减少全球发展的不平等、不平衡现象,使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增长的红利。

峰会的重点议题除着眼于历年峰会都在努力的国际旧格局的改革,包括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作用,继续推动世界银行投票权审议工作外,还着重提出发展绿色金融,促进包容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发展等发展理念。通过推动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机制保障,通过新的发展理念为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中国还通过自己在全球层面的积极行动践行对 G20 的承诺,促进包容联动发展。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向世界承诺不会通过人民币贬值的形式来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在 IMF 推动人民币加入 SDR 的进程,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推动世界经济开放格局的进程。中国还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国内外学者也对中国举办 G20 寄予厚望,希望中国能够带领 G20 国家在经济领域取得更大的突破。罗伊国际研究所研究员赛恩斯伯里称,中国主办权并不是跟中国有关,而是跟全球 85% 的经济力量有关,因此中国要行使跟其它国家一样的主导权,引导他们增强自身的决心。